

廣東青銅時代早期遺存諸問題淺析 — 從珠海棠下環出土石範談起

李岩

1994年春、夏，筆者有機會參加了珠海市平沙區南新分場棠下環遺址的發掘，收穫甚豐。在眾多的出土文物中，其中一件鑄銅石範引起了發掘者極大的興趣。原因有二，這件石範是廣東省考古工作者通過發掘所獲的首件標本；與石範伴生的還有其它遺物—陶器、石器。無疑，是對廣東青銅時代考古的一大貢獻^①。所以，筆者以棠下環發掘為出發點，就廣東青銅時代早期遺存諸問題略論一、二。

一

棠下環遺址位於古海灘之上，其北、西、東三面被低矮山峰所包圍，南臨大海。由於六十年代以後的不斷圍墾，現在的海灘已變成蔗田，東南不遠處有一條淡水河，仍可航行，流過，加之山間溪流，為古人在此生活提供了足夠的用水資源。遺址的分佈面積近兩萬平方米。本次發掘共揭露六百餘平方米。從棠下環遺址的地理位置和堆積情況觀察，為一處沙丘遺址。

棠下環遺址的地層堆積大致如下：表土層之下是唐宋文化層；再次是周歌層；周歌層之下是早期青銅文化層，即各探方的第4層至第6層。鑄銅石範出自第1發掘區的T8之第4層。

該石範由粉紅色砂岩製成，範通體長14.2cm，最寬5.6cm，厚2.3cm，其中一面磨製平整，另一方面呈弧形，兩端磨平，頂端有澆鑄口，為雙面合範之一半(圖一)。依觀察，所鑄之器似為斨，即長身斧。器長11.2cm，刃寬3.7cm。石範壁可能是由於使用所致，邊緣部份呈灰黑色。

經過對I區T8及其它各探方遺物的整理，我

們對與石範共存的陶器群有了初步的認識：以T8(4)為例，陶器以夾粗砂灰黑、紅褐陶為主；有少部份泥質陶，陶色見有灰、黑皮、橙紅、橙黃；此外，還見有一定數量的灰白色，灰色夾細砂陶。可辨認的器形有釜、簋、器座，飾以粗繩紋或交錯粗繩紋；有部份豆、罐是細砂陶製成；泥質陶的有圈足尊、折肩圈足罐、凹底罐、圈足盤等，飾以複線方格紋、雲雷紋、葉脈紋、曲折紋、弦紋等。夾砂陶豆之內壁有施灰白或赭色陶衣的作法。圈足盤以灰陶，特別是黑皮陶為常見。有部份夾砂陶釜腹部靠近頸部一端有鏤孔，據觀察，應當是該器物燒製完成後鑽成。陶器造型流行圓底、凹底、圈足作風，少許器物有鑿或流。

棠下環遺址的4-6層之陶器群各單位間未見明顯差異，無明顯的早晚之別，故可視為基本同時。

除陶器外，與石範共存的石器還有：石戈、有肩石環、鏃、網墜(數百計)、璜、玦、環、串飾等。

棠下環遺存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及南部沿海諸遺址相比較，其器物群特徵與東莞村頭遺址^②及珠海淇澳島東澳灣遺址^③相當接近，陶器的造形風格，器物型制、紋飾等均表現出許多共性。不同的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使得它們在器物群中不同功能的器物比重有所不同；由於要適應不同的環境，聚落形態有所差異^④。特別是該次棠下環遺址的發掘，個體大小不同的網墜達數百件之多。因此，棠下遺址的4-6層之年代應與村頭及東澳灣遺址接近。它們之間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別並非發展階段不同而產生的。那麼，其石範的年代亦應相同。

Li Yan : Deputy Administrative Officer, Guangd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ina
李岩：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辦公室主任



圖一 平沙棠下環出土石範
Stone mould found in Tangxiahuan

二

除棠下環外，廣東省內發現的鑄銅石範亦有相當的數量，分佈範圍較為廣泛。香港地區近期的考古發掘和調查亦所獲不少，由於條件所限，暫不涉及。

新中國建國前，外籍人士在粵東地區採集到斧及鈴範。⁽⁵⁾

粵北文物普查時，在東昌市老虎頭遺址採集到兩標本，一為魚鉤、一為鈴範。⁽⁶⁾

珠海市在文物調查工作中採集頗多：淇澳島亞婆灣遺址四件⁽⁷⁾，南芒灣一件⁽⁸⁾，南屏白沙坑一件⁽⁹⁾，棠下環遺址發掘期間，在斗門縣

乾務鎮繪船埔遺址又採集一件⁽¹⁰⁾。東澳島南沙灣遺址採集到一石斧⁽¹¹⁾，珠海石範主要是斧、範兩類。

中山市所見兩範均來自南崩龍穴遺址。⁽¹²⁾一斧一鑿。

下列，筆者將棠下環所出土的石範及共存物與所述各石範及有關遺物進行比較。

現汕尾市東涌寶樓村遺址之斧、鈴範據報告者所言：一同採集到的遺物是以夔紋陶為主的幾何形印紋硬陶⁽¹³⁾，超出本文之討論範圍。

樂昌兩箭：魚鉤箭，砂岩製成。完整。箭長7.2cm，寬3.3cm。上刻有大小魚鉤各一。魚鉤均有倒刺。箭一端有兩澆鑄口，大魚鉤尾部有一凹槽，似為專門出氣孔。另一為銅鉛箭，砂岩製成。一端殘。鉛箭石面長9cm，寬6.4cm，鉛箭殘長7.4cm，寬7.8cm。有鈕一端完整，相對一端殘，推測澆鑄口由於殘而不復存在了。而其一側刻有兩凹槽，疑是氣孔之功用。鉛箭左側還刻有一魚鉤，兩箭均是一箭兩器。

老虎頭山崗遺址位於樂昌縣城北約2km處的山坡地上，其中心位置在山崗西北的台地上。面積約萬餘平方米。與石箭共同採集到的遺物有陶器、石器。據文物志載：遺物大致

可分為兩組，一組是以三足鼎，長身弓背鏃為代表者，其文化面貌年代相近於石硤文化，另一組以折肩罐、器座、石戈等為代表，文化面貌與「石硤中層」、東莞村頭及茅崗遺址相仿年代亦不會相去太遠。石箭與老虎頭第二組共存，同時。

亞婆灣：共四件，一完整三殘。均為斧、鏃類石箭。紅色砂岩製成。箭體呈半圓柱形，背面磨光，頂端有澆口，箭內面有黑色澆鑄痕。標本亞採：1，殘長7cm，寬7cm，厚3.4cm；標本亞採：25，...長14.5cm，寬9.6cm，厚4.2cm；另一殘長4cm，殘寬4.5cm，厚2.5cm；完整標本長6.6cm，寬5.3cm，厚2.5cm。(圖二、三)



圖二 淇澳島亞婆灣遺址採集三件石箭
Stone moulds found in Apo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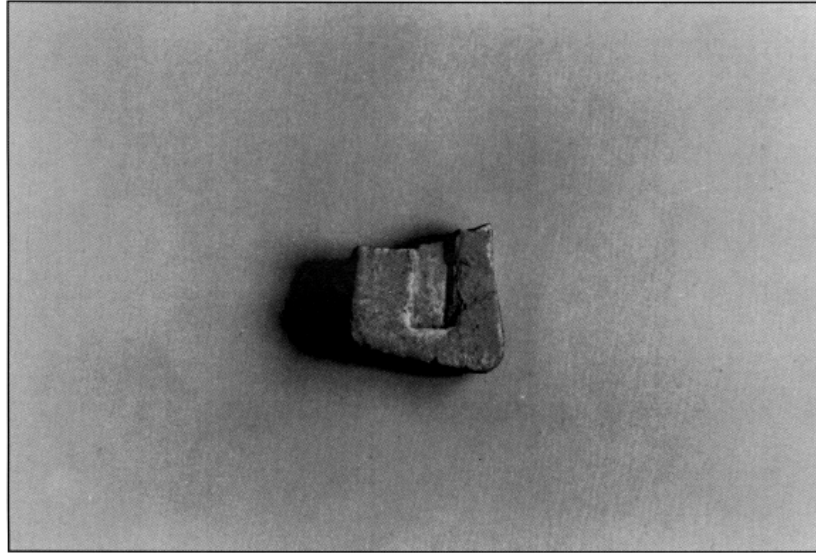
圖三 淇澳島亞婆灣採集石範
Stone mould found in Apowan

亞婆灣的石範均被報告者歸為第二組，該組還有一批陶器，據報告者的意見：亞婆灣第二組的年代與粵東「浮濱類型」¹¹⁴基本同時；略晚於東澳灣遺址。嚴文明先生認為：「第四期以亞婆灣遺址為代表，包括水涌二期及高要茅崗等，當是青銅時代早期的遺存。」¹¹⁵筆者同意上述的年代推測。須要補充的是：有流器在村頭和棠下環遺址均有發現，類似亞婆灣採：20、30的細砂礫在棠下環遺址亦不鮮見。所以說，亞婆灣第二組及石範的年代與棠下環器物群的年代似乎更接近。如果從亞婆灣所見石範之形狀觀察，有些類似的青銅斧之年代被定在周至春秋。這與本文推測的年代並不矛盾。首先，在亞婆灣的兩組器物中沒有見到夔紋及比其更晚的陶器或其它遺物；第二，金

屬工具的型制變化遠不如陶器型制變化得那麼快。因此導出另外兩種可能性：也許某些目前確認為夔陶時期的青銅器可能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年代會略有提前；也許將來的工作還會證明類似的青銅斧延續的時間相當長。

珠海東澳島南沙灣採集的石範為斧雙合鑄範一邊的刃端半截，殘長5.6cm，寬7.5cm，細察其共存遺物等情況基本與亞婆灣類似。

斗門縣乾務鎮船埔遺址的鑿形石範是棠下環發掘其間由珠海市博物館的考古工作者採集到的。該遺址所見之陶片與棠下環者無甚差別，可以推測，其年代與棠下環遺址者相接近。(圖四)



圖四 斗門縣乾務鎮船埔採集 鑿形石範
Stone mould found in Doumen

淇澳島南芒灣，南屏白沙坑所獲之石範，原報告者認為是與夔紋陶為代表的遺物共存，已超出本文所及，容筆者不述。

中山市兩石範均來自南葫龍穴遺址。龍穴遺址經調查及發掘情況觀察，有三組內容：一是以彩陶盤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二是與亞婆灣第二組接近的早期青銅文化；最遲的一組是若干夔紋陶片。

根據《中山歷史文物圖集》所載，其釜、罐的造型作風，如最大徑近底部、有流等在亞婆灣第二組、村頭、棠下環遺址中均可見到。筆者認為兩件石範可歸入龍穴第二組遺存中，雖然目前無法肯定這兩件石範的歸屬及年代，

但以石範本身以砂岩製成，而前述諸範均年代相若，可能是廣東早期青銅文化鑄銅業中一種通行的作法，故其有極大的可能是歸於龍穴遺址第二組的。上述年代相若之石範，具備如下共性：

- (一) 皆是小型工具範，二里頭文化早期的青銅器中各種小型工具佔有相當的比例。廣東地區的小型工具範出土之數量說明當時鑄造的小型工具在當時的銅器中亦佔有較大的比例。在各地的早期青銅文化中，小型工具的鑄造與使用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現象。無疑，廣東也不例外。青銅時代的定義中製造和使用青銅工具、武器、禮器是最基本的內容。

(二) 範均以砂岩製成，採用雙面合範技術。石範以砂岩製成可能是採集方便，加工容易。在江西關城文化中，石範使用相當普遍，兩地應當有著密切交流。如果以整體文化發達水平觀察，關城影響廣東的可能性大。如果與中原地區商文化相比較，石範帶有一定的落後性、原始性。

(三) 有些範可能是雙面有蕊者，如鈴等。

三

鑄銅石範的發現，向我們表明了一個事實。從那時起，廣東在相當廣泛的地區開始了本地的青銅鑄造業，無疑，棠下環的發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珠江三角洲及其它地區不久的將來也會出土更多的青銅文化物證。

將石範的證據擴展開去，正如筆者在前一節提到的各個遺存，年代相當者數量眾，分佈廣。除石範之外，這些遺存還具有一組趨同性十分明顯的器物群：石戈、陶尊、陶製凹底罐。不論是南部沿海、粵東的「浮濱類型」、粵北的石硤中層類型，還是村頭、茅崗等珠江三角洲諸遺存。而這樣一組器物群在吳城文化中亦不鮮見。由於篇幅所限，暫不涉及其詳盡的描述和比較，只想說明廣東之青銅時代早期諸遺存的發展並不孤立；所以將它們歸入青銅時代，除石範這一直接證據外，石戈、尊、凹底罐亦構成了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

廣東青銅時代早期遺存的年代問題，由於近十餘年的資料積累而更加清晰。棠下環遺址的發掘為研究者提供了石範及其共存遺物群之科學證據；亞婆灣遺址第二組中的釉陶陶器則顯示了粵東「浮濱類型」在發展過程中與其它遺存保持密切的關係，這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石戈、尊、凹底罐為代表的一組器物群普遍存在客觀事實；同時也說明，各遺存間在時間上是接近的。參考「浮濱類型」的年代，廣東之早期青銅文化的上限暫定在相當於商代中晚期比較適宜。

其下限的年代有兩組資料可以相互佐證：

亞婆灣第二組遺物與村頭、茅崗兩遺址比較，其年代與器物群均較接近；而石硤中層又與村頭遺址在文化面貌和年代兩方面相當接近；以珠海市為代表的沙丘遺址與村頭、茅崗等貝丘遺址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別是人們在相同的發展階段，對於不同的環境以不同的適應方式而造成的；已有專文論述⁽¹⁶⁾。石硤遺址上層是經發掘的變紋陶遺存之代表，同時證明了包括「浮濱類型」在內的早期青銅文化是早於以變紋陶為代表的遺存。

揭陽市地都蜈蚣山遺址堆積共三層⁽¹⁷⁾，其第3層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第2層可區分為2A、2B兩小層。「2B層出現有少量硬陶，陶器花紋中的長方格紋、菱格紋與曲江石硤遺址中層的情況較為接近，出現的釉陶及條紋、編織紋與饒平商代墓葬出土的同類器相近，時代約相當於商代。2A層曾受到後期的侵擾，除包含有第三層和2B層的同類器物外，陶片花紋中還見有重圈乳丁紋，變紋，時代大體在西周至春秋之際。」兩證據中均未見矛盾的現象，而且相互支持，可以說，廣東早期青銅文化年代的下限確定在變紋陶之前是適宜的。

如果將棠下環遺存置於廣東早期青銅文化之中，它的被發掘具有如下兩層意義：

由於此前廣東(大陸)地區所見之青銅文化早期的直接證據多來自採集，對於該階段的觀點、看法多屬於推測、或間接證據，而棠下環石範的出土則使這一情況得以改觀。

八十年代以來，廣東考古工作者在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區所建立的編年體系得到了一次實踐的檢驗。說明它是基本可信的，在變紋陶為代表的本地青銅文化之前還有一個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產生發展不是孤立的，不但具有內在的交流，也同時與中原及相鄰地區基本同時的考古學文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廣東早期青銅文化應當說具有自身的特點，這不但表現在文化面貌，與周邊地區的交流

流上，更重要還表現在它的發生、發展模式方面；所以，嚴文明先生曾指出：「廣東青銅文化的中心何在？高度發展的南越文化究竟是在怎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應該成爲廣東考古學研究的首要課題」⁽¹⁴⁾。目前，這一階段的基礎研究還很不夠，考古學文化或類型的劃分，更詳盡的編年體系的建立是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正是考慮到這些特殊性，筆者同意一種觀點：即不能將青銅文化與文明時代完全等同起來⁽¹⁵⁾，否則，我們的考古學研究就進入了一個誤區。實際上，這也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問題。從粵北到珠江三角乃至南部沿海，從目前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來看，已經顯示出這一階段廣東特殊性了。從一般邏輯推測，不同的環境在相同的發展階段會導致不同的適應模式。從考古學角度觀察，廣東更具該方面的典型意義。本文也只是分析，提出一些線索，更多的工作有待日後努力！

註釋

- (1) 1994年3-5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待刊。
- (2) 邱立誠、劉成基：〈東莞村頭遺址發掘的初步收穫〉，《廣東省博物館》(2)，1991年。
1993年3-7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待刊。
- (3) 廣東省博物館、珠海市博物館：〈廣東珠海市淇澳島東澳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9期。
- (4) 朱非素：〈珠海考古研究新成果〉，《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13)廣東文化廳編著：《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還可參閱麥兆良：《粵東考古發現》，香港考古學會。
- (6) 東昌縣文物志編寫組：《東昌文物志》，廣東人民出版社。
- (7)(8) 唐振雄、李子文：〈淇澳島亞婆灣、南芒灣遺址調查〉，《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 (9) 同(7)，見趙善德：《南屏鎮白沙坑、沙煲地遺址調查》。
- (10) 珠海市博物館梁振興先生調查所獲，並提供給筆者，特此致謝。
- (11) 同(7)，見梁振興：《東澳島南沙灣遺址調查》。
- (12) 中山市博物館：《中山歷史文物圖集》。
- (14) 廣東省博物館、饒平縣文化局：〈廣東饒平縣古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文物出版社，1983年。
朱非素：〈粵閩地區浮濱類型文化遺存的發現和探索〉，《人類學論文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
- (15) 同(7)，見嚴文明：《珠海考古散記》。
- (16) 同(4)。
- (17) 廣東省博物館、揭陽縣博物館：〈揭陽地都蜈蚣山遺址與油柑山墓葬的發掘〉，《考古》，1988年第5期。
- (18) 同(15)。
- (19) 吳增德、葉楊：〈論廣東青銅時代三個基本問題〉，《嶺南古越文化論文集》，香港博物館編製，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roblems Related to Early Bronze Age
Finds in Guangdong: Begin with the Stone Mould
Unearthed from Tangxiahuan in Zhuhai**

Li Yan

[Abstract]

A recent excavation in the sandbar site of Tangxiahuan in Zhuhai has brought to light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artefacts, of which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a sandstone mould-piece uncovered from Stratum 4. This piece and its missing counterpart will form a complete set of bivalve mould for the casting of a kind of bronze axe.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ever obtaine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the Guangdong region. Also uncover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were hundreds of stone implements and jade ornaments. Through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is mould and its accompanied finds, and a comparison of these finds with other stone moulds and accompanied artefacts obtained from Zhuhai and Lechang,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ultural layer belonged to a period from mid-late Shang to early Western Zhou. This period marked the dawning of bronze-casting industry, in other words, the early stage of Bronze civilisation in Guangdong.

As far as bronze-casting technique is concerne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Guangdon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Wucheng culture in the neighbouring province of Jiangxi.

Apart from stone moulds, many sites of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Guangdong often yielded a typical assemblage of artefacts consisting of stone *ge*, pottery *zun* and pottery vessels with concave bottoms. Since similar assemblages were also found in Wucheng cultur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from the latter is more obvious.

The assemblage of stone mould-piece and its accompaniment from the Tangxiahuan site is then compared with a similar one uncovered from Apowan in Zhuhai. The result has indirectly proved that early bronze cultures in Guangdong yielding pottery with double-f motifs should be preceded by the Fubin type of cultures. It also helps to confirm that the chronolog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established over the last decade is a reliable one.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in Guangdong w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unique history, social traditions,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 of this region. It is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other bronze cultures emerged and evolved. Current archaeological data have allowed a better picture of it to be successfully reconstructed.